

●翟屯建

明清时期的徽州刻书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盛极一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刻书概况,笔者曾撰《明清时期徽州刻书简述》一文加以阐述^①,本文仅就明清时期徽州刻书兴盛的原因及其贡献加以探讨。

一、徽州刻书兴盛原因

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是与环境影响、学术促进和徽商推动三个主要因素分不开的。

(一)环境影响。“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贍一”^②,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人们不得不从农田以外去想办法。于是“百工之作皆备”^③。唐宋以来,与印刷业有关的造纸、制墨工艺一直很发达。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白薄如一。”^④制墨“南唐李超及其子廷珪始作,宋时潘谷继之。嘉靖后,若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吴去尘,皆名重一时”^⑤。与刻版密切相关的砚雕和墨模制作,唐宋也已得到高度发展。“婺源研,唐开元中,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迭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之以归,刊粗成研,温润大过端溪者。……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献研,并荐研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研官,令石工周全师之,其后匠益多。”^⑥李廷珪的“双脊特龙”墨,造型精致,“层次之多,雕镂之精,称为绝技”^⑦。

到了明清时期,专事书籍雕刊的徽州刻工大量涌现,尤以汪、黄、仇、刘四姓最为突出。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⑧、《中国善本书提要》^⑨、《中国古代版画展览图录》^⑩、《徽派版画史论集》及徽州地区博物馆(即现黄山市博物馆)藏书著录的徽州刻工就有600余人,实际数字还远不止这些。歙县虬村黄氏一族,世代“剞劂”,从明天顺至清道光,时间长达400余年,刻书241种^⑪,可称得上“剞劂世家”。黄氏一族世代刻书,积累了丰富的刻书经验,特别在插图雕版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和精湛的技艺,为其他刻工所不及。对于他们这种世代赖以谋生的雕刻技艺,他们视为专利,秘不传人。于是,杭州、苏州、金陵等地的书商,为了保证插图质量,不得不高价聘请他们。因此,徽州不少刻工,大都因在外地刻有精美的插图而享有盛名。我国著名藏书家郑振铎对于徽州刻工高超的刻图技艺,常常为之赞叹,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些道理,应该加以深刻的研讨”^⑫。

除了专业刻工外,徽州还有大量的业余刻工,忙时务农,闲时刻书。徽州大量的家谱、族谱便是出自这些业余刻工之手。当地称这些刻工为“谱匠”。农闲一到,这些业余

刻工便三五成群,自由组合成“谱匠担子”,哪里有制谱生意,便到哪里去营生。因为一般谱牒印数不多,仅编号分颁各支,所以谱匠制谱多用木活字。他们担子里的“木子”(即木活字)多达二三万,一般分为大小号,大都是用梨木或银杏木雕成的老仿宋字。这是因为徽州地区山多,又盛产檀树、梨树、枣树、银杏树等,这些树种木质坚韧、经久耐磨,是雕板印刷用的极好材料。一个雕板往往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字不浸蚀。所以,当地雕匠们不仅将木活字作为谋生的工具,还把它当作一项动产,互相转借、买卖质当,有时还作为礼物辗转赠送。谱匠们制谱也有分工合作,一般分刻字、图象、排印和装订几道工序,最后由有经验的老谱师负责总成谱书。明清时期,徽州的大部分家谱、族谱均为活字版,就是出自这些业余刻工之手。

另外,徽州毗邻杭州、苏州、常州、金陵、吴兴等刻书中心,这些地区刻书业的发展,对徽州刻书业也产生了刺激和促进的作用。

(二)学术促进。徽州为学术渊薮,婺源乃朱熹桑梓,休宁是戴震故里。程朱理学和皖派朴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两面旗帜。学术的倡发赖于著述,著述的流传赖于刻印,新安学术对于徽州刻书的促进很大。

原始的徽州山民“始愿而朴”^⑧,随着北方士族的迁入,风俗由质趋文。从宋代开始,文化发展起来,衣冠之族注重谈吐、风仪、识鉴,“以诗书训子弟”^⑨。于是,科举登第者日多。自从出了朱熹,学风更炽。朱熹曾三次回徽州省墓,每次回来都要聚众讲学。南宋徽州学子三番五次雕刻朱熹的著作,无疑对徽州的刻书事业是个推动。另外,朱熹提倡读书,研究学问,从事著述,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⑩。在朱熹的影响下,徽州读书著述之风盛行,“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自井间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⑪,宋元以来彬彬称为东南邹鲁^⑫。

学术之兴,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书。要读书必须有书,要有书必须藏书。宋以来,徽州藏书家代不乏人。宋真宗时,歙县岩镇人闵景芳建尊圣阁,贮书万卷^⑬。明初歙县岩镇方大治“家故饶,……累世积书……里中称万卷方家”^⑭。清乾隆歙人程晋芳,“家素殷富,举族豪侈,晋芳独购书五万卷,招致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据案开卷,百务废不理”^⑮。藏书与刻书互为促进,互为因果。程敏政藏书不富,不会有《新安文献志》的辑刻;吴勉学刻的书所以精善,也是因为他能从众多的藏书中,择善本而付梓,广采摭而校仇。

学术兴旺,造就了徽州众多的学者。徽州学者做学问又多是从文字入手,以音韵训诂,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经他们手校的书,精审程度就大得多。宋仁宗时,婺源人王汝舟“所校书万余卷”^⑯。朱熹也曾说:“学者观书,必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径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一般,方能玩味”^⑰。其他如程荣秀、戴震、程瑶田、凌廷堪、胡培翬、俞正燮等,皆为一代考据大师,更是精通校仇,就是徽州书坊的一些主人,耳濡目染,潜心向学,是为儒商,他们所校之书的精审程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学术兴旺,学者众多,结果是著述宏富。据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著录,宋至清道光间的徽州学者著作就有四千余种,七万余卷。徽州素称“文献之邦”,确非虚语。徽州学子,一方面要使自己的著作流传于世,一方面又要维护学术师承,保存先贤著作,促成了徽州家刻书籍的兴旺。这些家刻书籍,一般都比较精善。

学术对于书籍的需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课蒙需要。清康熙年间,徽州全府有社学562所。至于私塾、义塾、家塾、蒙馆、经馆虽无统计数字,但从“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看,其盛况可知。课蒙通俗读物需求量大,损

耗也大。于是有些人就专门刻印童蒙书出售。清康熙时，歙县虬村人黄利中，“力田之暇，稍习为书贾，习为镌工，出其蒙童书售于邑。及久，镌益工，售益广，凡经史、古文、诗赋、试艺无所不镌，邑中缙绅人皆乐与交，业隆隆渐起”^③。刻印童蒙书而致富，真可谓生财之道。

（三）徽商推动。徽州古代经济，是以商业为特征的地方经济。明人汪伟曾说：“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④。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之内的刻书出版业，必然会引起徽州商人的注意。特别是明中叶，社会经济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一批市民阶层，他们追求精神享受，需要书籍。加之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对保守的程朱理学的冲击，出现了一大批蔑视封建传统和封建礼教，表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反映了当时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市民群众和进步文人的欢迎，使图书出版物有了空前广阔的市场。明万历时期，徽州众多的书商坊贾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徽商一进入刻书出版业，立刻显示出其固有的精明干练。他们在刻书方式、方法和雕板印刷技术上都大胆革新。

首先，他们大量编辑出版丛书。丛书最便学。一部丛书可概括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书，非买丛书不可。于是，吴师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二十子》，吴琯《古今逸史》、汪士贤《汉魏六朝诸家文集》，张潮《昭代丛书》等便如雨后春笋，相继推出，借此大发其财，但同时也推动了整个刊刻业的发展。

其次，大量刊刻插图，增加阅读兴趣与理解，引诱读者购买。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收录徽刻插图 360 篇。这些图版，格调新颖，式样翻新，丰富多彩。有的上文下图，如《蹶张心法》，明休宁程宗猷撰，天启元年（1621）

程氏刊《耕余剩技》四种本；有的文中嵌图，如《天梯日记故事》，明昭阳何胤宗校，徽郡书林周氏刊本；有的图文混一，如《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明尹高第撰，天启刊本，丁云鹏画，黄伯符刻；有的图中嵌文，如《酣酣斋酒牌》，明高阳酒徒茂先撰，黄应绅刻，万历歙西唐模许氏酣酣斋刊本；有的双页连图，如《大雅堂杂剧》，明汪道昆撰，万历大雅堂刊本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最多的还是单页插图。

其三，采取联合作战，缩短出版周期，快出快售。徽商经营讲乡谊，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在刊刻丛书或大部头书时，为了缩短出版周期，相互间常常联合作战。明万历刻本《资治通鉴》294 卷附《释文辨误》12 卷，多达 100 册，就是由胡三省、张一桂、吴勉学等数人联合刊刻的。这一现象也是这一时期部分大部头书署名混乱的原因。

其四，改革印刷和雕版技术。万历三十三年（1605），歙县程大约用四色或五色赋彩印刷《程氏墨苑》，图版精丽动人程度大大超过一般雕版插图。休宁胡正言又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彩色画稿分别用各种颜色钩摹下来分成数块小版雕刻，叠套彩印，创制“饴版”。又特制凹凸版，把纸在版上压印，凸现无色图象，形似浮雕，时称“拱花”。并采用这两种印刷方法，分别于天启七年（1627）和弘光元年（1645）印制了《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把彩色套印木刻画推向新的高峰。

出于经商需要，徽商还自编自刻了不少商用书籍。设在浙江的徽商惟善堂编刻的《典业须知》，掌柜自序称：“吾家习典业，至予数传矣。自愧碌碌庸才，虚延岁月，兹承友人邀办惟善堂事，于身闲静坐时，追思往昔，寡过未能，欲盖前愆，思补乏术，因拟典业糟蹋情由，汇成一册以劝将来。不敢自以为是，质诸同人，金以为可。并愿堂中助资刊印，分送各典，使习业后辈，人人案头藏置一本，得暇

熟玩,或当有观感兴起者,则此册未始无小补云尔。”⁵⁸其他还有《珠谱》、《各物出产》、《商程一览》、《水陆路程宝货辨疑》、《士商类要》、《天下路程图引》等。

还有一些徽商利用刻书进行广告宣传,扩大产品影响,打开销路。竞争最激烈的莫过于墨商。明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就有方于鲁刻的《墨谱》、程大约刻的《墨苑》、潘氏如皋馆刻的《潘氏墨谱》、方瑞生刻的《墨海》等。到了清代,又有曹素功刻的《墨林》、汪近圣刻的《墨藪》。为了宣传效果,他们争奇斗妍,在刻印质量上下功夫,促进了雕版刻印技术的发展。

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儒亦贾”。“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⁵⁹刻书便典型地反映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部分巨商在物质财富达到极点时,便转而广求天下奇书、珍本,收藏刻印,以求高名,追求精神财富。如马曰琬刻《经义考》、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鲍漱芳刻《安素轩法帖》等。这些富商财资雄厚,校勘写刻都不肯苟且,对中国古代文化建设之功不可埋没。

除了环境影响、艺术促进和徽商推动以外,对徽州刻书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宗法观念。徽州“家乡故旧,自唐宋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⁶⁰。名氏族为了纪世系,叙昭穆,辨亲疏,明确后裔辈份及其尊婢嫡庶等级,普遍撰修氏族家谱。有郡谱、县谱、合族之谱、分支之谱等不同谱式。又有族谱、统宗谱、世谱、世牒、支谱、房谱、家乘、家谱等不同名称,几乎没有无谱之族。赵万里指出:“传世明本谱牒,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徽州

以外绝少”⁶¹。一些大族所修之谱,不仅刻印工精,且卷帙浩大。如乾隆十八年(1753)刊印的《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8卷,每卷长51厘米,宽31.5厘米,共重约15公斤。又如《新安武口世系谱》40册,卷帙盈箱,一般人不能轻易搬动。徽州地区至今留存下来的谱牒之多,是全国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比拟的。

二、徽州刻书的贡献

(一)发展了我国的版画艺术。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说:“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像。时约在西历一千四百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之浮世绘版画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其时欧西木刻画固犹在萌芽也”⁶²。世界版画中国之最,中国版画徽州之最,此话一点也不过份。

现存最早的徽州木刻画真品为元末明初绩溪石氏家刻的《武威石氏源流世家朝代忠良报功图》(藏安徽省博物馆),全图高188厘米,横267厘米,内容为宋太祖的功臣石守信的先代及其本人的故事,所刻人物多至千数以上,千军万马,腾跃版上。其后见传的还有明天顺六年(1462)的《黄山图经》⁶³、弘治十二年(1499)的《休宁流塘詹氏宗谱》、嘉靖三十年(1551)的《欣赏编续》等。到了明万历时期,徽派版画起而主宰整个刻书业,其中以歙县虬村黄氏刻工为木刻插图的皎皎者。自明万历至清初,黄氏一族就有300余人的刻工队伍,其中作木刻插图的约100人⁶⁴。“时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黄氏。徽郡文士

之作,若高石山房目莲救母记,汪氏环翠堂弈谱、传奇、人镜阳秋,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固无论矣。即金陵刊之养正图解,南北宫词纪,杭州之海内奇观与夹白堂诸演义,吴刊之吴骚、吴猷,浙刊之徐文长改本昆仑奴,王伯良校注西厢记,凌蒙初朱墨本西厢五剧之类,无不出于歙县虬村黄氏父子昆仲手。沈德符野获编云:“养正图解,徽州人所刻,梨枣极精工。其图象出丁南羽手,飞动如生。盖徽郡出版事业之盛,自汪士贤与吴勉学师古斋、吴琯西爽堂、吴养春泊如斋以来,已凌驾两京建安矣。而版画之工,尤绝伦无比”^⑤。万历时期,北京、建安、金陵三派版画刻本基本上都是上承宋元遗风,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线条粗壮,构图简略。徽州木刻画则一扫粗壮雄健之风,成为工整、秀丽、缜密而妖媚的情调。其插图形式也趋多样化,如《闺苑》一书插图,万历十八年山西刊本为上图下文,到了万历四十年歙县吴养春泊如斋刊刻时改为单页插图。图版的加大,使徽州刻工缠绵精致的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程氏墨苑》、《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的出现,使徽州版画的绘刻技巧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刊花卉、蔬果鲜翠欲滴,晶润如生;禽鸟羽毛草虫网翼,脉络清晰,一笔不苟;雨后柳枝,风前荷盖,滴露未晞,流传欲掷;枯叶,虫腿,痕迹宛然,虫丝亦袅袅粘牵未断,穷工极巧,功媲造化。笺谱诸画,以没色凸版压印花瓣脉纹鼎彝图案与水波云痕,尤为胡氏创作。人物则潇洒出尘,水木则澹淡恬静,蛱蝶则花彩斑斓,欲飞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实已跻彩色版画至高之界”^⑥。它所体现的套版印刷法是我国在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二大贡献。入清以后,仍有黄建中刻《博古叶子》,休宁刘功臣刻《白岳凝云》,黄升中刻康熙《徽州府志》以及乾隆时佚名刻《古歙山川图》,清末佚名刻《绣谱》等木刻版画延续不断。

(二)推动了我国版本学、校仇学的发展。
徽刻图书版本价值极高,无论坊刻、书院刻和

私刻,都极讲究版本的精善,写刻校仇都不肯苟且。作为学者,倘若版本上错了字,可能导致自己所要阐述的思想相反;作为书商,则会失信于人,自短财路。如《汉魏丛书》有3种刻本:明徽州程荣刻38种,何允中刻76种;清王谟刻86种。范希曾认为“程刻最善”^⑦。徽刻以精善著称,以致外地的家集都拿到徽州来刻。《袁中郎先生全集》“先是家有刻不精,吴刻精而不备。近时(引按:指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刻者愈多,杂以《狂言》等赝书,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栴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语,按年分类,都为一集”^⑧。王重民评价《袁中郎先生全集》万历本“刻于新安,剜剔极精”^⑨。

徽刻图书不仅写刻校仇认真细致,在辑佚补缺上也颇见功力。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临海陈基著、金华戴良编《夷白斋稿》,久无刻本,仅有钞本流传,且遗失甚多。明弘治间张习为之刊刻时,或有衍文,或有脱漏,非常不理想。于是鲍连博非常留心该书,后访得一明钞本,并取他书与张刻本相校,墨笔眉批触目皆是,均谓某字应钞入,某字该去云云。稍有所得,痛快非常。如卷六眉端记云:“此一行刻本亦脱去,今从《草堂雅集》补入,真快事也!”^⑩

(三)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徽刻图书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奠定了后世学术研究的资料基础,使学术研究有据可依。以徽州地方文献为例,大者如一郡文献集刻。明弘治十年(1497)休宁程敏政集刻《新安文獻志》100卷附《先贤事略》2卷,采录南北朝以后新安一地的文章1138篇,诗1053首,搜罗之富,篇幅之巨,为地方总集所罕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凡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藉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巨制”^⑪。中者如一族文献集刻。清光绪间绩溪胡氏世泽楼为了保存金紫胡氏一族先贤著述,原拟有计划地辑刻金

紫胡氏丛书,并已刻印了《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3卷作为张本,陆续刻有《斋中读书》、《古韵论》、《黄帝内经素问校义》、《说文管见》、《文选第证》等,惜功未竟。小若如一家文集刊刻。乾隆四十年(1775)吴我炽编撰《吴氏传家集》9卷附《乐府》1卷、《诗余》2卷、《填词》1卷。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其他如志书、宗谱编纂刻印连绵不断,先贤著作一再翻刻衍续,使徽州成为名符其实的“文献之邦”。

长期以来,徽州以传世文化典籍极为丰富而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形成了一股国际性的“徽州学”热。1985年,安徽省和徽州地区相继成立了徽州研究会。以徽州作研究课题的作者众多,其中国内有傅依凌著《明代徽州商人》^[3]、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4]、章有义著《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5]、国外有日本人滕井宏著《新安商人研究》^[6]、斯波义信著《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7]、美国人居密著《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和宗法制度》^[8]、荷兰人宋汉理著《徽州地区的发展和当地的宗族》^[9]等。据统计,仅中山大学叶显恩教授所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所引徽州刻本文献(志书、宗谱、文集)就达100余种。滕井宏所著《新安商人研究》的主要资料则是依据明万历《歙志》和汪道昆的《太函集》。他说:“1940年,我曾在东京尊经阁文库读书,因另有目的,浏览万历《歙志》,对其中构成新安商人核心的歙商活动状况记载之详明,史料之多,大为惊讶,自是,我遂开始研究新安商人问题。……战后不久,我在静嘉堂文库翻阅明代各种文集时,发现汪道昆的《太函集》,乃是有关徽州商人史料之宝藏,为之狂喜。拙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就是以《太函集》所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作为本书的骨架,也只有根据《太函集》的各种史料,始有可能为立体的、结构严密的掌握新安商人营业状况开辟道路,谅非

过言。拙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发表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各种研究中多有从《太函集》引用有关新安商人史料的,由此可以想见《太函集》之重要。”^[10]

歙县江旭奇编辑,吴养春校阅梓行的《朱翼》一书,杂采诸书,以类排纂,间有言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庞杂不伦”^[11]。王重民却认为:明末为我国学术极解放时代,亦为极盛兴时代,当时虽无期刊日报之刊行,此类小类书实具有现代流行刊物性质。一面征引古人之嘉言懿行,一面汇入当时之新知识、新思想,故虽朝生夕灭,已尽传播文化之责矣。比如撰书人江旭奇,既载入自己之言论,亦载入自己师友之言论,更尽量载入当时通俗社会内最通行之读物,非以要名,亦非为师友作宣传,乃以适应当时社会一般读书识字者之需要也。……又如丙辰为万历四十四年,是时天主教士评著之书方流行,读书人方在欢迎新说,《委贄部·交通》目内引利玛窦《友论》数则,且引冯应京序两则,《志林部》所引尤多,凡引《七克》五条、庞迪我二十条,案语用庞说一条,西儒说一条。《七克》刻成于万历四十二年,一年之后,即若是通行,在彼教中人将谓为其宗教之受人欢迎,余则以为明末之上习如此,而此类小书,正是期刊之先河也^[12]。该书对于了解明末社会思潮及研究中国报刊史,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徽刻图书还收录了大量西人的作品,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万历三十三年,程人约《墨苑》内刊有四幅西洋画,一为信尔涉海疑而即沉;二为二徒闻实即舍空虚,三为淫色秽气自遭天火;四为圣母怀抱圣婴耶稣之像。明代中国有西洋画不足为奇,但被中国美术界采纳,用于墨模之上,刊于典籍之中,却只有《墨苑》一例。万历四十年程百二辑刻《方輿胜略》18卷附《外夷》6卷,书中全载利玛窦《世界輿地全图》,为汉籍引入西洋地图之先“潘光祖等所得世界輿图知识,皆从此书裨

而来,此其所以较他书为可贵也”^④。

又次是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贡献。徽州刻书对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医学。南宋歙人张杲于淳熙十六年(1189)写成《医学》10卷刊行于世,此书是我国最早的医史传记,东传至朝鲜,李朝时代成宗十五年(1488)曾于刊行,其后《东医宝鉴》也引用此书;日本万治二年(1657)也将此书刊行,可见影响之大。明祁门人汪机除自己著述发扬新安医学外,还致力于保存古代医著。在他年过花甲时,访得一本元末明初朱升的秘籍《咏诀刊误》,经过补订,写成《矫世惑脉论》与原书一道刻印出版。他年过七旬时,又发现朱丹溪的门人戴原礼阐发丹溪学术思想的孤本,遂又逐字抄录,加以校刊,命名为《推求师意》问世。上述两种医学“秘本”、“孤本”能够流传后世,是汪机的一大功劳。明歙人江璀嘉靖时编辑《名医类案》12卷,上采扁鹊、仓公、华元化诸家,下迄元、明诸名医治验,分205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既忠于原始资料,又随附评论,驳正发明,颇为精审,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书。璀初成此书时,未及刊刻即谢世。其子江应宿又以璀之医案和他自己的医案分类附后,刊行于世。岁久版绝,清乾隆时,鲍廷博又为重刊。至于歙人吴勉学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4卷的事迹,更是书林佳话。为了表彰吴勉学学校刻医书的功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特地收录了他辑刻的《河间六书》,“以不泯勉学缀辑刊刻之功”^⑤。1961年,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编的《全国中医联合目录》中的全国现存各种医籍刻本,徽州所刻名列第一。

天文学方面,有现存最早的集珠算之大成的程大位《算法统宗》17卷。清乾隆知不足斋刊有《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益古演段》、《续古摘奇算法》、《丁巨算法》等。嘉庆歙人汪莱撰《衡斋算学》7册自刊,在解代数方程上有重大突破。

物理学方面,清代歙人郑复光于道光二

十六年(1846)刊刻自著《镜镜冷痴》一书,系统总结了当时中外的光学成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光学著作。

农学上则有明汪士贤著刻的《菌谱》、《茶谱》、《芝谱》等。

徽刻图书还保存了不少珍本秘籍和通俗读物,使很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和文学名著得以传世。如郑之珍编刻的《目莲救母劝善戏文》对徽剧、川剧、汉剧、婺剧、桂剧、昆曲、湘剧等剧种、剧目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马曰琯千金刻《经义考》,使这部文献巨著得以保存。鲍康的《观古阁丛刻》为钱币学初皋。我们现在喜爱的几种古典小说,最初也是徽州刻印的。如120回本《水浒传》,最早的刻本是明代新安刊刻的。《红楼梦》书成后,仅有抄本流传,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徽州程伟元两次用活字印出,即后来的程甲本程乙本^⑥。《聊斋志异》书成之后,蒲松龄无力印行,藏之于家,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由鲍廷博为之刊行^⑦。

徽州刻书对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明郎瑛《七修类稿》就指出:“近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歙人程允北明天启七年(1627)编刻《天都阁藏书》25卷,著录自钟嵘《诗品》以下诗论14种,讹错百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坊贾射利之本”^⑧。因射利而粗枝大叶,是所有坊刻的通病。徽州一些坊刻亦未能免俗,但这是少数。徽州刻书的贡献与不足相较,是高山与抔土之比。徽州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永存。

参考文献

- ①刊《文献》1988年第4期。
- ②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汪伟奏疏》。
- ③嘉靖《徽州府志》卷1《风俗》。
- ④《文房四谱》卷4,《学海类编》丛书本。
- ⑤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 ⑥罗愿:《新安志》卷10《杂记》,清光绪李氏刻本。
- ⑦周芑:《徽派版画史论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页。
- ⑧《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 ⑨《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⑩《中国古代版画展览图录》,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家通讯》编辑室、中国古代版画研究会筹备会联合编印。
- ⑪同7,26~33页。
- ⑫《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年版,667页。
- ⑬王世贞:《重修文学记》,见道光《徽州府志》卷2~5《舆地志·风俗》。
- ⑭汪藻:《浮溪集》卷19。
- ⑮《朱子语类》卷18。
- ⑯道光《休宁县志》卷1《风俗》。
- ⑰嘉靖《徽州府志》卷1《风俗》。
- ⑱向敏中:《闵氏尊圣阁记》,见《岩镇志草》享集《艺文》,顺治12年留耕堂藏版。
- ⑲《岩镇志草》享集《儒行传》。
- ⑳民国《歙县志》卷7《人物志·文苑》。
- ㉑嘉靖《徽州府志》卷16《名贤传》。
- ㉒《朱子语类》卷11。
- ㉓歙县《虬川黄氏宗谱·黄义先老人传》,道光刊本。
- ㉔同2。
- ㉕同9,302页。
- ㉖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 ㉗同17。
- ㉘天津《大公报》,1934年2月第12期,《图书副刊》。
- ㉙同12,488页。
- ㉚周芑“疑此本为宋嘉定刊,明天顺间程孟修补辑印”,见7,53页。
- ㉛同7,7页。
- ㉜同12,497页。
- ㉝同12,499页。
- 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25页。
- ㉟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万历刻本。
- ㊱同9,656页。
- ㊲同9,548页。
- 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9《集部·总集类四》。
- 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
- ㊵《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 ㊶《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 ㊷日本《东洋学报》1953~1954年第36卷1~4期。
- ㊸《山本博士学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
- 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㊺莱登大学《通报》,1984年。
- ㊻《新安商人研究中译本序言》,见《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13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 ㊼同38,卷138《子部·类书存目二》。
- ㊽同9,383页。
- ㊾同9,186页。
- ㊿同38,卷105《子部·医家类存目》。
- ①转引自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因未见原文考证经过,存疑。
- ②萧新祺:《〈聊斋志异〉版本略谈》,刊《博览群书》1987年7期;并见《贩书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96页。
- ③同38,卷134《子部·杂家类存目二》。

(上接58页)

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在新西兰参观访问期间,受到了各界人士和图书馆界同行们热情友好的接待。在此,我们代表团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中国与新西兰两国人民及两国图书馆界的友谊日益发展!

paper is referential to libraries in other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Library pests --- Guang Xi

Library pests --- Survey report

G253.6

The book engraving of Hui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Zhai Tunjian //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1). -31~38

The book engraving of Huizhou was in fashion for a tim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1.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making of paper and Chinese ink which is closely interrelated to book engraving had been much developed and the wood available to book engraving produced in Huizhou. Huizhou was small in area but densely populated. So book engraving beca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life; 2. Academic development; Two banners of ancient academia --- a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Cheng Zhu and Anhui school of Pu Xue (it is a school of Confucian reading) . were emerged in Huizhou at that time. Scholars were numerous and writing increasing sharply. The rising of academia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engraving; 3. Merchants effects; Merchants of Huizhou took book engraving as a method of making money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promoted obj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engraving. The book engraving of Huizhou played positive role in advancing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ng woodcuts and wood block register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ition subject and proof reading; keeping a lot of valuable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So Huizhou became " the state of documents" .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ppear to specialize Huizhou, such as: Fu Yiling and Ye Xianen of China, Jimmy of America. Hanli Song of Holland, Fujii Hiro of Japan. A prevailing of "Huizhou Craze" has been formed. With 68 references.

Book engraving --- Huizhou

A M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 Research

A Q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 Research

G256.2

Figures in the field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1): wu Erzong/ Chen Jie //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89,15(1). -39~42

Prof. Wu Erzong (1912-1987) was born in 1912 in Zhejiang. He passed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Suzhou Dongwu University in 1928. He graduated from Wuchang Wenhua library school in 1937. He transferred to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in 1951, and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library. He held the post of director of librar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AMMS, and was appointed the member of Subcommittee on Terminology of Chinese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of Documentations, the deputy head of editorial board for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adviser for " Informational Vocational